

在苏联解体前居然抱怨买不到手纸。对于一个能送卫星上天的国家来说,这绝不是能力不行,而是因为沟通不畅没有及时了解百姓诉求。因此,中国政府一定要利用媒体在平时积累信誉,危机时则抢抓发言权。具体对策包括:公共媒体要在第一时间抢发言权和解释权;解释一定要力求公正,以树立公信力;高级官员要利用互联网多与民众直接沟通,了解民众的真实需求。

此次中东变局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大致有如下方面:第一,欧洲国家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大,目前欧洲各国最担心的是难民潮,未来则意味着欧洲与北非国家的合作面临更多的困难;第二,阿拉伯国家近期的经济困难进一步突出,但如果在政治骚乱后其政治有所改良,则对其长期的现代化进程有好处;第三,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不得不有所加强。

中东乱局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有所损失,另外,由于油价高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但是,该事件的战略影响看来利大于弊。第一,中国政府在12天内从利比亚撤出35860名中国公民,显示了

强大的行动能力和以民为本的外交理念,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第二,此次事件中未被推翻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可能会对美国不满,因为美国一直处于犹豫状态,并最终抛弃了阿拉伯盟友,比如穆巴拉克在下台后就拒听奥巴马电话,其资产则被瑞士银行冻结。第三,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目前处于军方、自由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宗教势力三方博弈状态,其中美国会助推前两者结合共压“穆斯林兄弟会”。但是,三方争取的对象都是动乱的主力军即埃及年轻人,其中“穆斯林兄弟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最大,所以选举若真能顺利举行,有可能是“穆斯林兄弟会”获胜。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最近撰文所言,革命之后最有可能胜利的恰是最有组织的力量。若此,中东便会出现埃及、伊朗两大反美国国家联盟,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第四,如果埃及军方和自由派共压“穆斯林兄弟会”,那也将造成埃及局势进一步混乱,美国不得不分散精力维持其稳定,从而减少对东亚地区的战略投入。○

北非中东政局动荡归类分析

殷 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大体看,北非、中东国家发生的政局动荡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无外部势力直接介入的国内政治斗争,比如埃及和突尼斯。以埃及为例,穆巴拉克虽然不得人心,但在外部合作方面成绩突出,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友,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国际反恐斗争的干将,美国没有理由坐看他非程序性地被赶下台。中东伊斯兰极端势力尽管对穆巴拉克恨之入骨,但没有能力煽动埃及民众造反。埃及变天是少数“4·16运动”的青年人筹划的,手段极为高明。之所以得到举国响应、导致穆巴拉克最终下台,是因为穆巴拉克执政时间过长,其家族势力过于强盛,构成了对国民利益的剥夺。突尼斯的情况与埃及相同,本·阿里的毛病与穆巴拉克如出一辙。

突尼斯和埃及的共同点还在于军人集团的支柱作用。伊斯兰极端势力长期受到打压,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已明显改弦更张,修正了原有立场,走上了合法的道路。因此,即便强势领导人垮台,也不至于导致国内混乱和伊斯兰势力扩张。此类国家的民主运动被西方认为是“安全的革命”。

第二类是得到外部势力支持并有地区力量角逐,比如巴林和也门。几乎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不同比例的什叶派人口,尽管他们信奉的并不是伊朗国教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派,而是多为栽德派即第五伊玛目派,但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朗的影响。如也门的胡塞家族,公开表示要效仿伊朗体制,同黎巴嫩真主党没有本质差别。在巴林,占人口多数的

什叶派的确受到不公待遇,但由于伊朗的介入,巴林的动荡已经不单纯是国内民主运动了,一些反对派干将甚至受过真主党训练。可以说,伊朗正在利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国内矛盾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对于有什叶派因素的阿拉伯国家政局动荡,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不抱同情立场,并对伊朗的活动保持警惕。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被认为是“不安全的革命”。对于海湾国家的“民主改造”,美国已经大大降低了调门,海湾君主国受到的压力减轻,得到了更多的美国军事支持。因此,不必担心海湾国家会变天,尽管改良式的民主化进程会持续下去。

第三类是近乎原始体制下的国民起义,仅仅发生在利比亚。卡扎菲的利比亚体制,是独出心裁的部落政治变种,这个国家没有政党,没有名义上的政府,只有所谓的人民协商和举荐制度,实际上是地方部落责任制。卡扎菲作为全利比亚部落联盟的大酋长实施了超过40年的独裁统治,随心所欲,毫无章法。这样的国家一旦生乱,是难以控制的。因为缺乏现代政治活动规则,没有像样的反对党领袖,班加西的临时政府及随后出台的过渡委员会,有反卡扎菲部落联盟色彩,很难得到外部力量的信任。出身于小部落的卡扎菲,一贯将关键位置留给自家人,安全、情报、特种部队、内卫部队和空军,都是其亲信或雇佣军,一有风吹草动,非嫡系部队就陷入分裂,叛离成风。目前利比亚的内战,就是这样形成的。

卡扎菲历史上的对外政策为西方所不容,但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卡扎菲已经洗心革面,被西方接受。加上他在禁止一切政党的同时也严厉镇压逊尼派势力,防范什叶派渗透。在一个面积等于4个伊拉克的国家成功地遏制宗教极端势力,这是西方念念不忘的。因此,对于如何处置卡扎菲,西方是踌躇的,瞻前顾后的。利比亚的民众起义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推翻卡扎菲的目的,除了反对力量缺乏领导核心之外,西方不积极配合也是原因之一。

第四类是很难发生民主运动的国家,比如叙利亚。叙利亚是一个没有接受基辛格安排,未能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主要前线国家,其国土戈兰高地至今被以色列占领,同以色列仅仅处于停战状态,并拒绝接受美国的“民主改造”。在对待“穆斯林兄弟

会”上,叙利亚采取铁血手段,不仅所有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一律被当做犯罪分子,1982年的哈马屠城事件更是对境内激进伊斯兰势力斩尽杀绝式的镇压。在镇压宗教极端势力方面,叙利亚和利比亚有一拼。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对反对派的压制和监控几乎是天衣无缝的,权力已经安全地过渡到第二代。复兴党的安全力量非常强大,反对派几乎没有活动空间。此次中东民运浪潮,叙利亚也有青年人通过“脸谱”串联游行,尽管有一些响应者,但无一人敢到场逞能。后来发生的中年妇女游行,只提出了民生诉求,回避了政治诉求。可以说,只要政权足够强大,控制足够严密,民主运动发生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当年的萨达姆政权就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政权经不住外力打击,何况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本身就是少数派。

考察北非、中东政局动荡的原因和条件,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民主价值观被普遍接受,也就是说,有思想准备。美国对中东的“民主改造”并非始于伊拉克战争之后。早在1978年,民主党总统卡特在积极推动埃以和平的同时,也积极主张对伊朗进行“民主改造”,目的在于改变巴列维国王的专制。这一次改造的结果是,被卡特认为代表民意的霍梅尼建立了一个与美国为敌的新政体。并不能说民主价值观是美国的专利,伊斯兰传统的协商制度本身就是反独裁反专制的,当民主意识成为普遍意识的时候,民主运动就有了公众基础,成为普世价值观,为反对独裁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是具有一定的民主活动空间。美国对穆巴拉克政权是爱恨交加的。穆巴拉克的对外形象无可挑剔,但对内的虚假民主早就令美国忍无可忍。2005年埃及大选之前,赖斯在获悉穆巴拉克释放明天党主席之后才同意访问开罗,且压迫穆巴拉克修改选举法,结束了仅穆巴拉克一个人竞选的局面。在“大中东民主改造”中,埃及受到的压力比较具体,反对派势力得到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为此次民众广泛参与做了铺垫,并为提高国民的公民意识起了促进作用。此次埃及民运表现出了埃及公民很高的国民素质,过激行动很少,过激口号基本没有,少数极端宗教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另当别论。

三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为群体活动提供了技术支持。尽管穆巴拉克当局一度关闭互联网,停止短信发送,但运动的初始阶段,的确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串联的。可以说,美国发明的技术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提供了技术保障。

四是民怨沸腾是基本动力。贪污腐化、特权阶层垄断高利润经济部门、家族专制和其他社会不公现象,是中东政治动荡的基本动力。加之高失业率和低度社会保障使得底层民众和无业知识青年忍无可忍,一有机会便揭竿而起。所以,避免政局动荡的

根本手段不是压制,而是尽量消除社会不公。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无论是本·阿里还是穆巴拉克,抑或是卡扎菲,他们在执政的早期,大体是廉洁奉公的。一旦其子女成人,形成“绿二代”,特权家族和特权阶层就控制所有高利润经济部门,社会不公就会加剧,民怨的积累也会加剧。无论第一代的口号叫得多响,民心的丧失已不可避免。对这个规律,需要有清醒认识。埃及和利比亚的教训,也需要认真汲取。○

北非中东政局剧变及其主要国际涵义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11年伊始,突尼斯首都突然爆发大众造反,导致铁腕执政 23年的总统本·阿里逃离该国。仅约半个月后,因为地理、历史和战略等缘由可称阿拉伯世界首要国家的埃及亦急剧爆发首都等大城市的民众造反。加上北非、中东其他多个国家迸发的类似连锁乱局,大半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的政治关注立即压倒性地集中于北非、中东。至今,尽管埃及 30 年来的全权统治者穆巴拉克迅速倒台,但这场跨国风暴远未平息,而且在某些国家愈演愈烈,同时阿拉伯世界中近期前景扑朔迷离,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全在未定之天。

然而,有一项相当根本的论断已经可以做出,那就是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观察家先前对北非、中东基本政治和社会局势的理解,有着严重的缺失和扭曲。因为特别在埃及和一定程度上在突尼斯,规模巨大、能量强劲的“第三力量”惊人地急剧迸发,而在中东、北非的大风暴大乱局之中,埃及和突尼斯的剧变分别因其影响之大和触媒性质至今仍是最重要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第三力量”和“惊人”:所谓“第三力量”,就是在“9·11事件”往后近 10年里流行全球的那个范式(或曰美国塑造、坚信和推广的阿拉伯世界当代根本形势解释范式)——“美国支持的专制政权 vs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

势力”——之中见不到的、以世俗性愤懑为其造反潜能的城市大众;之所以“惊人”,是因为几乎全世界都用美国的这个范式看待阿拉伯世界,因而对于现在所见的北非、中东风暴和乱局缺乏起码的思想准备和深刻的理解能力。一句话,世界对风暴爆发之前和之后的北非、中东急需一种与上述美国范式颇为不同的理解。

就埃及事态以及突尼斯事态而言,其大众造反力量大致由处于极端专制政权之下的几乎所有城市“弱势群体”构成,从学生、专业人士、失业青年一直到富裕的中产阶级,用《纽约时报》的话说,其广泛性“震惊了甚至对穆巴拉克先生的政府最持批评的那些人”,而“埃及最有力的反对派运动穆斯林兄弟会大致驻足于背景之中”。从大局而非某些细节来说,他们在投身造反时基本上没有组织、没有领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纲领,唯有一条,即可恨的穆巴拉克必须立即下台。除了这一共同目的或诉求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具有吸引力和象征性的共同汇聚地点即开罗解放广场,那在西方舆论聚光灯式的关注和有力襄助下,在大造反的 18天里每天都吸引成千上万人前往和留驻。

埃及以及突尼斯(也许还有其他某一些北非、中东国家)的大众造反有其最基本原因和形势性原